

鏡中的自我

王錫璋

——讀雷蒙·道森著「多少中國滄桑」有感

中國是個古老而有著悠久文化的國家，在人類史上長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華民族所衍化的文明，如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認為的是直接產自原始社會的最古老文明，也是湯氏劃分世界文明為廿六種文明中目前依然存在的五大文明之一（註一）因此身為中國人的我們，也常以此自豪，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歷史文化最悠遠、最完整的國家。中國的確有她長久輝煌的時刻；春秋戰國的百家哲學思想，曾經開出燦爛的學術花朵；兩漢時期張騫、班超開拓西域所造成的絲路，蔚成中西文化的第一次交流；隋唐盛世則上溯春秋戰國之學術思想、秦漢大一統之法制及社會組織，奠定中國文化之雄厚基礎，而隋唐國威領土之擴展，對外通商發達，文學藝術之裔皇，則不啻是當時羅馬文化正值黑暗時期之世界文明燦揚地區。及至蒙古西征，鐵蹄踏至義大利，使十三世紀初的歐洲，對「黃禍」這個字眼，心有餘悸。

但近百年來的中國，却是個苦難的時代，翻閱一部中國近代史，無異是中國的一段血淚史——鴉片戰爭的砲火一響和接下去的幾次歐美船堅炮利的摧毀，震破了中國一向認為自己為「四方之尊」、「堂堂大國」的威嚴；中國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爭取霸權、商益的戰場，淪為列強魚肉的次殖民地，其所受的創傷，至今仍餘痛在身；而最大的影響，則是整個民族精神觀念的改變，由以前的鄙視「夷人」，而至崇洋、媚洋。

對中國的知識份子而言，或許崇洋、媚洋是不對的；他們是看到中國已是危在旦夕，為了謀求亡國圖存之道而不得已的「師夷人之技以制夷」，因而有清同、光年間張之洞所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以及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推行的「自強運動」，和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維新運動」。及至民國，則有五四時期之新青年所謂的全盤西化運動。而無論是清朝的幾次西化運動的失敗也好，或是民國以來，為了是否該全盤西化所引起的爭執等這些前塵後浪中，我們必須想想我們是否仍在下著自己擺設的棋局，而忘了「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棋局的兩方——都是我們自己，一方是盲目地對西方崇拜的所謂全盤西化者，一方則是對西方盲目否定的抱殘守缺不思進步的人——是否都沉於自我情緒的窄域中而不能顧及大局？

歷史是一面鏡子，所謂「旁觀者」也是一面鏡子，都是能够使自己看到本身的優點或缺陷的。唐太宗曾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故曾為他上十思疏的諫臣魏徵一死，他即喟然曰：「失一鏡矣。美國社會學家顧理（Cooley, Charles Horton）曾以「鏡中自我」（Looking glass Self）一詞以說明自我觀念過程的概念——一個人對他本身所做的各個判斷，係他人對他態度的反映。簡單的說，也就是自己由別人的眼光得知自己的好與壞。因此，探討前述中國從元朝的恢宏氣象到

近代爲西方鄙視的器物文明和政治腐敗，而在歷盡這百多年的傷痛之餘，我們仍帶著懷鄉似的觸痛，緬懷我們既往的光榮——悠久、博大的五千年文化；可是我們有沒有想到自元朝七百多年來，西方人如何看我們？我們又如何從歐美人那裏發現自己的缺失？或者由西方人眼光中挖掘一些他們對我們的誤謬之見，以資作爲我們對自己的修飾之用？以最近美國某廣播電視員爲了亂用「孔夫子說」Confucius Says 而引起全美婦女的抗議而言，美國婦女抗議的是事關女權問題，而我們是否應該細想我們的「孔夫子」說爲何現在成爲人家口中輕佻之語？中國大使館爲了慶祝美國開國兩百週年而送給休斯頓市政府的一座孔子銅像的禮運大同篇的譯文所引起的字眼挑剔，我們是否也該檢討我們的文化是否一直爲外人所誤解、甚或歧視呢？或是僅如外交部、大使館所說的「純屬無稽」而置之一笑呢？（註二）

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著，孫慶餘翻譯的這本「多少中國滄桑」，便是報導了七百多年來，西方人如何看中國。雖然作者在第一章中說：「本書可以當作一本通俗文明史來看」，而「這一冊

薄薄的書，無法涵括所有的史料，讀者只能把本書當作一個大綱而看」，但在坊間一向缺乏歐美人士對中國文化、歷史探討的書，有的話也是陷於主觀或是深奧的學術思想，雷蒙·道森此書則客觀地將七百年來，西方對中國的「直接」認識，擇要列出，作者希望「從回顧中，能給予那些關心中國的人一些靈感，使他們對這民族重新估價」，而身爲主角的我們，應可從這面鏡子——這面「多面鏡」，看出我們多年來所受的瞭解和偏見。

由此書前面幾章敘述的「天府之國」、「耶穌會與中國」、到第四章的「永恆靜止的民族」而至後面幾章「陽關道與獨木橋」、「柳條型文化」、「異教的中國」，我們似乎可發現，西方人對中國印象的改變，正如作者所說的「受中國社會變遷的影響不大，受歐洲思想自身的激發却極大」，也可以說，自明朝以後，西方本身有所謂「啓蒙運動」、民主思潮運動、工業革命、和地理大發現的航海探險，這些活動都造成近代西方文明的蓬勃發展；而中國則受到本身哲學思想的影響，一直堅持著一種崇高的文化理想，固執著「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退

化的歷史觀」(註三)，文明似乎停頓了。由此書前面一張照片——一座巍峨的宮牆，下面是兩匹驢騾拖著一輛破舊的運米車在塵沙中蹣跚地走著——似乎顯示著中國以往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有如此巍然的建築)，而現在是個衰落的民族(驢騾拖破車，不勝荷負)。中世紀時期，歐洲旅行者到中國後對中國的描述，包括最有名的馬可孛羅(Marco Polo)的遊記，他們的敘述，「使中國在歐洲人眼中是個富麗、堂皇的地方。雖然他們的觀察僅止於中國社會所表現於外在的秩序和繁榮而已，但亦可由此而知當時中國的文化意識在在都勝過西方。及至明季為傳教而到中國的耶穌會教士，由於他們本身都是學養豐富而且能便宜行事，在不乖違教會目的和理想限度內，順應中國的習俗，因此他們能以西方迅速發展的科技知識打進中國宮庭，受到朝臣及皇帝的愛戴。這是中西文化的重要交流，耶穌會教士對中國當時的政治制度和學術思想極為讚賞和發揚，利瑪竇翻譯的四書流傳到歐洲，使當時的西方哲人包括萊布尼茲、伏爾泰、史賓諾莎等都受到孔子學說深刻的影響，而大力提倡孔子思想。中國某些官員如徐光啓、李之藻等亦體認到西學之

精奧，思想觀念因之一新，西方學術亦漸由傳教方式輸入中國。可惜在清初由於教會各派之內爭，導致康熙皇帝之禁教，西學輸入之路因而中斷。」

個人認為導致中國近代悲劇的關鍵在此。傳教士西學中斷並非主因，而是明末清初大部份士大夫的觀念仍是狹隘的，尤其到了清朝乾隆後，上至皇帝，下至朝臣，對西方「夷人」之長，仍抱著彫蟲小技不足為的可有可無心理，因此傳教士西學中斷後，却仍閉關自守不思派人出去對西方作一番探索和學習，這固是中國一向「居四方之中，撫周邊之夷」的觀念作祟，却也導致中西的差距愈來愈大。及至鴉片戰爭後，東來的歐美各國，對正當政治腐敗的滿清統治下的中國印象，自然是大大異於從前了，而這個印象，很不幸，却一直累積了下來。「多少中國滄桑」前面有一幅被歐洲人醜化的中國皇帝肖像，連中國人都不知道中國皇帝是這副德性。想是清朝鴉片戰爭前，西方各國特使屢次氣憤於覲見中國皇帝須按中國的三跪九叩之禮，導致雙方各為尊嚴問題的不歡而散，使得西方人由想像而渲染中國皇帝是這麼一個凶狠、傲慢的德性。滿清官臣的無知，致使中國在閉關百多年來所積

下的弊病，自鴉片戰爭前，中英爲通商問題而頻頻折衝接觸即漸爲英人所洞悉。乾隆五十八年，英使馬戛爾尼曾爲商務問題而覲見乾隆皇帝，回程時高宗使馬氏經內地至廣州再回國，其目的在「令該英人順道觀覽，俾知民物康阜，景像恬熙」而增加對其「天朝」的敬畏。殊不知馬戛爾尼反而對中國之故步自封老大帝國之外強中乾而有更深之認識，在他所著的「乾隆英使覲見記」中曾指出中國之落後數事如：近代知識的幼稚、士大夫之自尊性、軍備之落伍、政治之腐敗、民生之困苦等。（註四）因此爾後各國敢以極少數兵力侵入領土廣大的中國，對中國發動侵權的戰爭。

中國在這些戰爭中屢次失敗，連帶地使中國文化受到歧視。因之在「多少中國滄桑」第七章「異教的中國」便指出：十九世紀初期，過去幾世紀來歐洲對中國（包括政治制度、哲學思想、語言、藝術等）的狂熱，已逐漸爲輕視所取代，中國對歐洲的魅力已盛極而衰，一蹶不振，而一度曾被十八世紀歐洲人視爲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儒家思想，已淪爲不合時宜的古怪教條，中國智者中的智者孔子則已淪爲充滿迷團和笑料的滑稽人物。（如前述孔子在美國之「受難」

，可見此種觀念至今仍存在），而此書中所附的歐洲對中國印象的各種畫片，在在都顯示他們對中國的輕視，歐洲人筆下的柳條型文化（按：此書譯者孫慶餘君譯筆甚佳，使人不覺讀此書爲讀西方人所著，唯一缺憾是某些名詞未加詮釋，或附以原文，以供查考。像此處柳條型文化，筆者查社會學、人類學等辭典皆無此中文名詞，亦無原文可另供查檢——唯查辭海、辭源有「柳條邊」一詞，謂指清時在東北爲防蒙古內犯，插柳條以示界，是否以此而指當時之閉關文化，因筆者純係外行，尙待編者或讀者高明以指正）是一位留著長辮子的滿清大官，左手撐傘，右手肩刀，大搖大擺的走著，後面跟著像扶新娘禮服般地扶著他的長辮子的小兵——這是多麼奇形怪狀，連我們自己看了都不禁要大吃一驚。

雖然作者曾說：「歐洲人眼中所見的中國，主要還是他們自認爲是的中國。」但在翻閱此本偏重文明、歷史遞變的「多少中國滄桑」，正如譯者在序言中所說的：「雷蒙·道森的公正和客觀的報導，讓我們看出了七百多年來西方對中國的印象，但無論瞭解或偏見，它們都是中國人的一面鏡子」——而在已往

前塵的回顧，在未來後浪的前瞻中，我們到底從這面鏡子可看出什麼，以資作爲警惕呢？

其一，七百多年來，西方對中國是在盲目崇拜、盲目否定的矛盾情緒中，而我們今天對西方是否亦是如此呢？昔日視之如夷人，今日視之如天人——五四時期高喊的打倒孔家店，及後來的全盤西化主張，視中國固有文化爲國家強盛、發展之最大阻碍。固然，邁向國家現代化途徑中，習西方科技之長是必須的，但科技發明的高度發展所引起的危機如環境污染、噪音及道德之敗壞等問題，是不是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所必須避免的？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之「西方的沒落」一書，以生物學觀點看西方文化之面臨死亡；梭羅金（P. A. Sorokin）之「社會文化動力學」把文化分爲理念、中庸、感性三大類型，指出現在西方的文化正是感性文化面臨瓦解重組的時機。此兩位學者對西方文化診斷的學說雖各自有其缺失（註五），但亦應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其二，「多少中國滄桑」一書中曾指出西方人自耶穌會到中國後，「中國缺乏科學成就」這個觀念便已根深蒂固存在西方人腦中，即至現代亦是如此。而

中國人在長期的耳濡目染之下，也已經接受這種看法。雷蒙·道森爲我們否認，他提出李約瑟（Joseph Needham）所著的「中國科學與文明」七卷巨作，顯示中國自古即有相當卓越的科技成就。我們也要爲我們自己否認，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的獲得諾貝爾獎，也顯示中國不乏科學人才。但中國人對自己本身的科學文明，爲什麼必須勞動英國人幫我們整理，爲什麼楊振寧等必須入美國籍，必須在國外從事研究才能得到殊榮，這些問題，是不是和爲什麼今天漢學研究中心在國外而不在國內，同樣值得我們探討？

其三，中國在西方人眼光中所受的輕視、歧視至今仍隱隱約約存在，唐人街的中國區域仍被視爲落後、髒亂地區，中國人在西洋電影中大都仍是身著長袍馬褂，頭覆瓜皮帽那種卑微相，甚至前幾個月西德某考察團到臺灣來參觀所發表的觀感是：「原來臺灣是這麼現代化！」似乎對他們而言，中國失去了神秘的真面目。我們在經濟發展方面，雖是十足進步，但在西方各國有很多對我們仍是陌生的；我們的文化復興推行委員會，在國內如火如荼的推展現代化中的文化復興，但孔子在國外仍受到委屈。因此我們是否該檢

討我們的宣傳不夠？在今日反共聖戰中，宣傳應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但我們是否做得不够理想？卜少夫在「受想行識」一書中，曾多次指出我們「對內宣傳重於對外宣傳」；而我們一些高等知識份子如陳若曦及「顏元叔散文集」裏提到的一位外文系畢業同學等，為何在出國後，即迷失了方向而必須以親入鐵幕後的痛苦來換取血淚辛酸的教訓？是否連我們自己的知識份子在外國環境對我們長久留下的觀念和印象的衝擊下，而也抓不到我們的根，以致亦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反被另一股邪惡的宣傳所誘惑？在感嘆中國七百年來的多少滄桑中，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掩卷再加細思的。（註六）

【附註】

註一：湯恩比將中國文化，從本質上劃分為兩個階段——春秋戰國時代為一階段；南北朝以後又為一階段。前者稱之古中國文化（*Sinic Civilization*），後者謂之遠東文化（*Far Eastern Civilization*）。湯氏認為中國文

化自南北朝以後，受外來文化之影響，已非單純保持中國固有之文化，且古中國文明業已夭折、停滯，僅遠東文明和世界其他四種文明（即西方、基督教、伊斯蘭、印度文明）僅存。但湯氏對中國文明之劃分，實忽視了中國人口發展之地理不同而疏略了各代文化綜合之整體性。此可詳見劉伯驥撰：「中西文化交通小史」第四頁及參見湯恩比著：「歷史學研究」（*A Story of History*）。

註二：見六十五年十二月廿一——三日臺北各報社會版。

註三：參見章政通著：「現代化與中國之適應」P120～P127。

註四：詳見李守孔著：「中國近代史」P65～P67。

註五：參閱楊升橋譯：「當代文明的危機」。

註六：有關雷蒙·道森對中國的剖視，另可參見其所著：「中國文化之垂統」張潤書譯，六十一年復興書局印行。